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
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研究生姓名: 王金明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许晓永、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金融专硕

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金明 签字日期： 2024.06.03

导师签名： 许晓东 签字日期： 2024.06.03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金明 签字日期： 2024.06.03

导师签名： 许晓东 签字日期： 2024.06.03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Internal
Control**

摘要

我国经济历经四十余载的高速增长，逐渐暴露出长期积累的问题。过往的高速发展往往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其粗放型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代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我国经济正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强调创新的核心地位，推进包括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新。制度创新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在中国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耦合和互动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实践的进步，非正式制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当非正式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时，能够显著促进金融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深化的背景下，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因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打破企业融资困境、提升融资水平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传统型权威理论和声誉理论，理清关键脉络，根据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构建了综合分析框架，分析传递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借鉴实证分析法研究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与企业融资约束三者关系并验证假设，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同时，非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与企业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最后，内部控制缺陷在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旨在从不同方面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现状，为上市公司解决筹融资困境提供参考，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内部控制 融资约束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gradually exposed long-term accumulation problems.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often came at the cost of sacrific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extensive model is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China's economy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country emphasizes the core position of innovation and promotes innov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ory, syste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formal institutions, has a close coupling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which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actice, informal institutions will also undergo corresponding changes. Wh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dapt t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n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ntext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the issue of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restri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ifficulty in financing" and "high cost of financing" are important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breaking through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ir financing level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select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20 as samples, and takes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entry point to deeply study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ombin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principal-agent theory, traditional authority theory, and reputation theory, the key context is clarified. Based on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Drawing on empir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ternal controls,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verifying hypotheses, a robustness test was conducted to ensure the rigor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formal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egre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enterprises; Meanwhil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in enterprises; Finally,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iming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aced by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provide reference for listed companies to solv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market systems. These suggestion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Informal Institution;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al constraint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2
1.1.1 研究目的	2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综述	3
1.2.2 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综述	3
1.2.3 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间的影响综述	5
1.2.4 文献述评	6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7
1.3.1 研究内容	7
1.3.2 技术路线	8
1.4.3 研究方法	9
1.4 创新点及不足	9
1.4.1 创新点	9
1.4.2 文章研究的不足	10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2.1 核心概念	11
2.1.1 非正式制度	11

2.1.2 内部控制缺陷	12
2.1.3 融资约束	14
2.2 理论基础	15
2.2.1 委托代理理论	15
2.2.2 传统型权威理论	16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18
2.2.4 声誉理论	19
3 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现状分析	20
3.1 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现状分析	20
3.2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现状分析	21
3.3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现状分析	24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8
4.1 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8
4.2 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9
4.3 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2
5 非正式制度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检验	33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33
5.2 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	33
5.3 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35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36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6
5.4.2 相关性分析	37

5.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38
5.4.4 基于三步法检验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40
5.5 稳健性检验	42
5.5.1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	42
5.5.2 滞后回归	44
6 研究结论与对策	46
6.1 研究结论	46
6.2 对策建议	46
6.2.1 内部控制环境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46
6.2.2 企业文化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47
6.2.3 信息与沟通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48
6.2.4 社会资本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50
参考文献	51

图表目录

图1.1	技术路线图	8
图2.1	内部控制五大要素	14
表3.1	2017年-2021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情况表	22
图3.2	我国关于融资的相关政策	26
表5.1	变量说明	35
表5.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6
表5.3	相关性分析	37
表5.4	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回归结果	39
表5.5	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回归结果	40
表5.6	内部控制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42
表5.7	替换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后的回归结果	43
表5.8	滞后一期回归分析结果	4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企业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想要持续发展，使既定目标得到实现，需要具有充足的资金流作为保障。然而在实际的市场情境中，融资约束是大部分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22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不论是在民营还是国有企业中，企业家普遍认为融资困难和资金短缺是他们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之一。世界银行发布的权威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非金融领域的上市企业中，高达75%的企业正面临资金不足和难以融资的严峻挑战。显然，融资约束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对企业日常运营和规模扩大构成了不小的阻碍。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确保发展中企业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长远发展，更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融资难题已成为制约众多企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打破这一困境，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国外著名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在其理论中提出，在理想的完美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资金成本相等，因而不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困扰。这一理论建立在资本市场完全透明、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之上，并假设所有投资者均为理性经济人，能够充分理解和评估投资机会。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市场充满了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等诸多复杂问题，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从而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委托代理问题则可能引发代理冲突，损害企业的利益，进而对融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企业外部层面的分析，而内部制度因素往往被忽视。因此，本研究以制度层面为切入点，旨在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两个维度，深入探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融资约束问题的成因和机制，而且能够有效地补充和完善融资约束问题在制度层面的研究成果。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目的

在2021年4月8日财政部联合证监会共同发布的《关于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后原中小板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中再次提出了内部控制体系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内部控制紧密相关，一个高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在控制内外部经营风险以及确保资产的安全性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非正式制度也体现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各个方面。本研究在探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基础上，特别关注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核心内容作为以下问题围绕展开：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建立和运行；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中介作用如何发挥；非正式制度通过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对融资约束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将以定性和定量方法为基础，结合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等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以验证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产生的中介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本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了内部控制这一新视角，以研究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复杂关系。详细探究了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融资约束，内部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中介角色，以及非正式制度影响融资约束的作用路径。本研究不仅充实了内部控制领域的理论视角，还丰富了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的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本研究通过以内部控制在上市公司中的变化及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作用路径为视角，为企业提供了扩宽融资渠道和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理论支持。

(2) 现实意义。本选题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一：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好地理解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提供实质性的改进建议，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对于上市公司进行内部制度的完善，使内部控制作用可以得到稳定有效的发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选题在探究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及融资约束的影响时，得出尽管正式制度在

企业管理中发挥着基石作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制度往往难以覆盖所有细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亟需更多的额外支持，并在企业内部完善非正式的制度框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团结、激励、规范和提高效率的多重功能。

1.2 文献综述

1.2.1 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综述

在国内外企业进行融资时，非正式制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传统的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更为灵活的资金获取方式（Zheng & Wei, 2018）。非正式制度凭借其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可以有效地缓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戴亦一（2016）在深入研究2008年至2015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后发现，声誉机制在非正式制度中广泛存在，如政治关系、商业团体等，均能够为企业带来声誉资本，良好的声誉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市场地位，更能有效促进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规范机制对于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具有显著效果。郭蓉（2022）进一步指出，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不仅为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正式制度形成了互补关系，共同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2 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综述

Hooghie等（2015）针对内部控制建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展开了一项深入研究，他们精心收集了来自29个国家的1669家公司的共计4491个样本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背景对内部控制建设的影响显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内部控制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类似地，Kanagaretnam等（2016）进一步探讨了国家文化中的三个关键维度：个人主义倾向、权力距离感和不确定性规避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之间的关联，发现这三个维度不仅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与否，还对其程度产生深远影响。Zexiy（2016）则强调，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的背景下，扩大有效的内部控制范围成为重中之重，这包括转变企业组织

形式、将内控范围扩展至各部门，以及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作为内控的重要环节。

我国学者张立恒等（2022）深入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特征，认为其具备自发性、持续性、非强制性和广泛性，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它发挥着软约束的作用。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正式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空白，因此企业内部控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价值观、道德观和风俗习惯来提供支持。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缺陷间关系的探讨尚显单薄。通过参考现有文献，可以从多个层面来深入探讨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的潜在影响：

首先是企业传统文化层面。郑石桥和郑卓如（2013）的研究表明，当正式的内控机制与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存在冲突时，内部控制体系的完整性与有效性会受到挑战。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石的内部控制理论框架，强调非正式制度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地位。王清刚（2014）强调，在构建全面系统的企业管理职能时，内部控制体系不仅依赖于严谨的制度和流程设计，更需提高企业价值观、道德素质的培育水平。企业文化建设对于营造积极的内部软环境至关重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增强内部控制的实际效果。沈烈等（2014）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以人为本”在构建和谐内部控制环境中的核心作用，认为将我国特有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与内部控制理论相结合是推动内部控制理论的本土化和创新的关键支撑。余雁（2017）则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主张通过构建良好的信任机制和完善非正式制度建设，来深入领会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并据此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

其次是企业社会资本层面。马丁娜（2006）认为社会资本对内部控制具有双面性，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她指出，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如滋生小团体主义、阻碍信息传递等，对内部控制造成挑战。同时杜永波（2016）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内部控制建设有巨大贡献，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这两类资本的优势，以实现内部控制的最佳效果。

最后是管理伦理层面。朱敏（2014）建议将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精神内核指导内部控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软控制”的理念，以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1.2.3 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间的影响综述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当内外部融资成本完全一致时，企业才不会面临融资约束，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在当前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企业在筹集资金时，主要依赖于内部和外部两大融资途径。其中外部融资又可分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这些融资方式的成本，往往取决于股东或债权人对收益的期望，通常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投资者投出资金的风险也高，因此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应越高。Lambert（2007）利用CAPM模型，对内部控制、企业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越为完善、执行效率越高时，其运营风险也会相应降低，进而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这一结论与Hadlock（2009）的研究结果相契合。Hadlock指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最终会转化为更高的权益资本成本。内部控制的质量不仅关乎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更是企业能否顺利获得融资的关键因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企业在融资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相反，Costello等（2011）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难以获得较低的贷款利率，这进一步加剧了其融资约束的程度。

在国内研究方面，张金鑫等（2013）指出，内部控制的缺陷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当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存在缺陷时，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可能变得混乱无序，导致应用于重要项目的资金被浪费或挪用。此外内部控制的缺陷还可能为贪污行为提供可乘之机，使得企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的信任度降低，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经理层在内部控制的建立、监督和执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樊后裕和丁友刚（2016）通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更加完善、执行更加有效时，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往往更低。

李莉等（2019）收集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至2018年的财务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框架越完善，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效果就越显著，进一步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遏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确保企业运营的稳健性。陈汉文等（2015）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升企业的日常经营效率，增强其盈利能力，从而赢得债权人的信任，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宋蔚蔚等（2019）的研究也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融资约束程度负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缓解融资约束。

此外，非正式制度在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规范行为和道德标准能够激励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降低内部操纵和财务舞弊的风险，从而增强债权人对企业的信心。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也能够强化非正式制度的效力，通过构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企业能够更好地履行承诺，遵守行业规范和商业道德，提升声誉和信誉度，进而增强非正式制度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效果（North, D. C., 1990）。

1.2.4 文献述评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研究的综述分析，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文献中，国外研究的相对较少，国内外学者统一认为非正式制度在实际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国外关于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的文献主要是从融资成本、企业风险和会计信息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国内研究主要是从管理层能力和行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等方面出发，两者出发点不同导致研究的方法存在差异，但国内外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是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与融资约束程度之间成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缺陷越少，融资约束程度就越低。在关于非正式制度和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较早，研究的方向也更加全面，涉及文化、制度、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资本结构等各方面，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化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把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从企业传统文化，企业社会资本和管理伦理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研究方向较国外相比更加明确。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在当下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充裕的资金无疑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本文综合结合国内外关于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以及融资约束的丰富文献与理论成果。研究对非正式制度的探讨,旨在揭示其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同时,本文还深入剖析了内部控制在两者间所发挥的中介机制作用,文章共由六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本章先从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出发,然后对国内国外的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融资约束的研究动态和现状进行了综述,并针对文献进行了总体述评,明确本文要做的工作,对研究内容、技术路线,研究方法进行说明,最后归纳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借助相关文献对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的涵义进行界定,同时重点梳理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传统型权威理论,作为后续研究的分析依据。

第三章: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现状分析。本部分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现状分别进行了描述,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做好铺垫。

第四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部分分别对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影响、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影响以及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机理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假设以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实证和分析。

第五章:非正式制度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检验。本部分选取了216家上市公司2016-2020五年数据,首先根据理论采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指标,通过DEA分析法对各上市公司2016年-2020年五年的制度效率进行评价,后将综合效率作为非正式制度衡量指标,以SA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指标,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最后选取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为后续分析以及提出建议提供依据。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对策。本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研究的主要结论，再分别从非正式制度层面和内部控制层面提出了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对策建议。指明研究局限性和有深入分析价值的地方，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1.3.2 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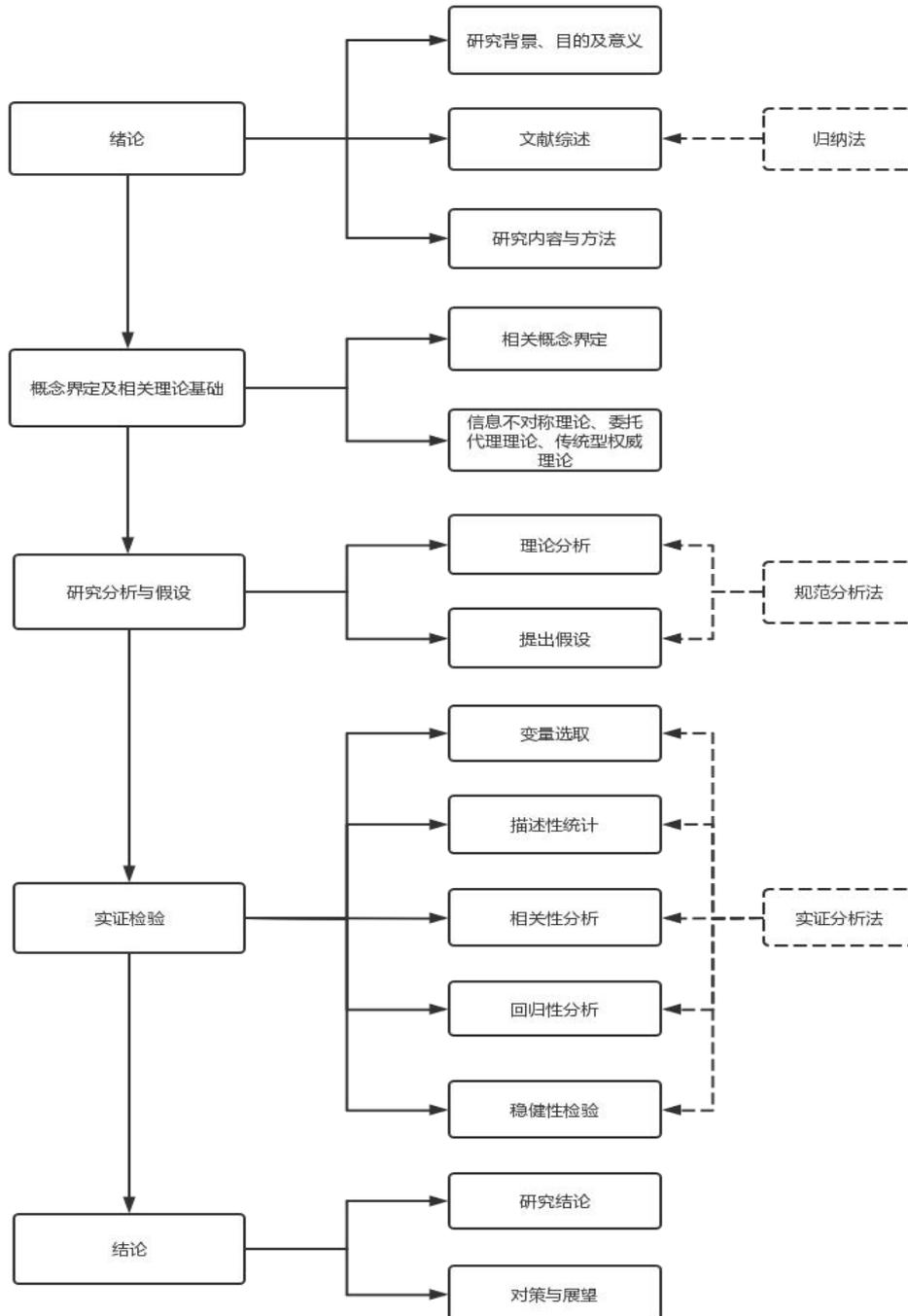


图1.1 技术路线图

1.3.3 研究方法

根据金融与计量经济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分析基础,本文逐一进行了合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具体分析方法包括:

(1) 文献归纳法。通过广泛查阅和深入研究大量相关文献,系统地梳理了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以及融资约束的各类影响因素,并深入探究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更加全面地理解了这些要素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在以文献归纳法为基础,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并进一步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之间的作用路径和机制。

(2) 规范分析法。本研究综合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传统型权威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等多个相关的理论,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内部控制机制;最终,本文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深入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作用和影响。

(3) 实证分析法。通过与其他研究方法对比,实证分析方法科学性与严谨性更强。因此,本研究选取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并综合运用多种数据收集手段,包括数据库下载以及手动整理,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形成面板数据,使用STATA15.0和DEAP2.1等软件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旨在验证研究假设和计量模型的合理性,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深入分析实证检验结果,最终得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从而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1.4 创新点及不足

1.4.1 创新点

(1) 视角创新。根据国内外众多的文献资料,鲜少有学者深入研究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关系。目前关于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方面,鲜有学者将二者进行整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本研究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建设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状况的影响机制。在非正式制度建设程度各异的情境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传递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资本市场的潜在投资者在接收到这些差异

化的内部控制信息后，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评估，从而做出更为精准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决策的变动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融资能力，进而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基于此，本研究以创新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内部控制如何在非正式制度和融资约束之间发挥作用的机制。

(2) 内容创新。通过理论和机制分析可以得出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现有文献大多对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单独研究或两两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研究将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共同作为出发点；同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加入对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的现状分析，为下文研究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三者之间实证关系提供依据，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1.4.2 文章研究的不足

关于非正式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由于自身水平限制，评价体系可能会遗漏重要变量。且由于2021-2022年新冠疫情对上市公司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选取截至2020年度，研究的时效性相对较弱。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2.1.1 非正式制度

(1) 非正式制度的含义

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或标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是个体在做出决策时所参考的依据。制度主要由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形式组成，通常被称为正式制度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文制度，它代表了人们通过正式途径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这其中包括了政治规定（如宪法、政府监管）、经济条例和合同条款。非正式制度则指那些没有正式约束力，但对某种具体事务起一定作用的规范或习惯，如习俗、惯例、传统等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时间的互动中无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具有长久的驱动力，它是一代代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不像正式制度一样客观存在，而是主观上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自律性和其他非强制性的“软性约束”来实施的。非正式制度可以被细化为多个方面，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复杂多元的内涵：首先是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如一个地区的历史传统、习俗和信仰结构；其次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社会资本、企业员工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资本、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资本。其中，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和企业员工与社会间的社会资本属于前者。在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社会资本代表了他们在长时间合作中所建立的信任、相互利益和合作的各种形式的认同，例如企业的团结力。企业间的社会资本即是指企业间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关系和互信机制。企业员工通过在社会团体中的交往和合作，积累起社会资本，这些资源对企业至关重要，能够助力企业解决难题、开拓市场。同时，企业以自身名义构建与社会的信任、合作和互惠关系，不仅树立良好形象，还为企业提供稳定外部环境，促进长期发展，例如企业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和构成的信誉。最后是规范和引导人们行为的治理体系和规则，包括道德观念、传统习惯、默契和承诺等方面。这些都属于非正式制度。

(2)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经济价值的创造深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直观的角度分析,非正式制度是人们为了降低摩擦和冲突、减少交易开销、增进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以及提升工作效率而建立起来的。而从更深入的角度看,非正式制度在减少交易与竞争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为企业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合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能够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潜在利益的最大化,即产生合作效益或合作剩余。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还有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能够推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积极互动,确保双方的合作更为高效、有序;能够促使企业在长期内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其持续竞争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正式制度也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和信誉等的塑造和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收益。一个健全的非正式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创造和增长。无论在任何时代,人力资本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非正式制度则会极大地增强人力资本的效率和作用。非正式制度,如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人的内在能力的中心,它们不仅与人的智力和体力因素紧密结合,还决定了这些因素能够发挥到何种程度。

在企业层面,企业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涵盖了企业文化、职业道德、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以及企业的社会资本等方面,这些要素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革新的速度相对较慢。非正式制度主要由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企业社会资本所组成,其内容丰富多彩,正式制度涵盖了内部规章、岗位职责等方面,并带有强制执行的性质。非正式制度则主要体现为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以及员工个人行为规范。在公司的内部控制结构里,正式制度具有明显的“他律”特点,而非正式制度则体现出“自律”的属性。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只有当这两者紧密结合时,企业的内部控制才能得到有效建设,从而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并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1.2 内部控制缺陷

(1) 内部控制的定义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为了避免或减少潜在风险、降本增效并有效地控制风险，构建一套全面的动态管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企业带来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需要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相对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持续优化企业的产业布局，实现经营效能稳步增长，并推动企业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明确指出内部控制是企业为了达成其控制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

（2）内部控制的目标

内部控制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环节，其目标的设定不仅关乎组织内部管理的规范与效率，更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整体战略与长远发展。内部控制目标是指对实现内部控制所要求达到的目的而提出的预期标准，因此在构建和实施内部控制体系的过程中，明确其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内部控制设定了五个核心目标，包括合规性目标、资产安全目标、报告目标、商业运营目标以及战略规划目标，彼此之间紧密关联又相互限制，共同构成了内部控制的完整框架。在资产安全目标中，要求企业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在追求合规的目标时，要确保内部和外部都是合法和合规的。从内控角度讲，内部合法合规是指企业在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前提下，通过合理有效的手段达到公司治理结构要求、业务运作规范以及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可靠等目的。从外部合法合规的角度来看，企业受到法律政策、行业制度等多方面的限制；从企业内部合法性和合规性角度来看，由企业制定的规章和设计的流程等因素，都在对企业内部管理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管，从而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若忽视内部和外部的合法合规标准，那么企业就难以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

资产安全目标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资产安全目标是对资产进行全面管理，以防止资产损失的一种手段，也就是为了使资产达到预期价值。资产安全的目标是基于资源的有限性而设定的，企业应该把维护资产安全作为自身的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内部控制结构。这个目标的深层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确保公司的资产不会受到损害或流失，其次是把有限的资产和资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资产安全目标是一个系统概念，它由多个子系统共同组成，其中内部控制作为最重要的一环，对资产安全具有直接影响作用。此外，高效

的内部控制机制也有助于更好地获取高质量的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协助管理团队做出对企业有利的决策，以实现公司的长远目标。战略目标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设立的具有前瞻性的目标，能够助力企业达成其整体愿景。

（3）内部控制的要素

在COSO报告中，明确指出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这五大核心要素（参见图2.1）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一个健康稳固的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和基础。风险评估环节则负责设定明确的目标，为后续的控制活动提供指导。而控制活动则是确保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过程。此外，内部监督作为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一道重要防线，为目标的达成提供了额外的保障。然而，所有这些要素和环节的运行，都离不开信息的及时传递和有效沟通。信息的畅通无阻，是确保内部控制体系高效运作的关键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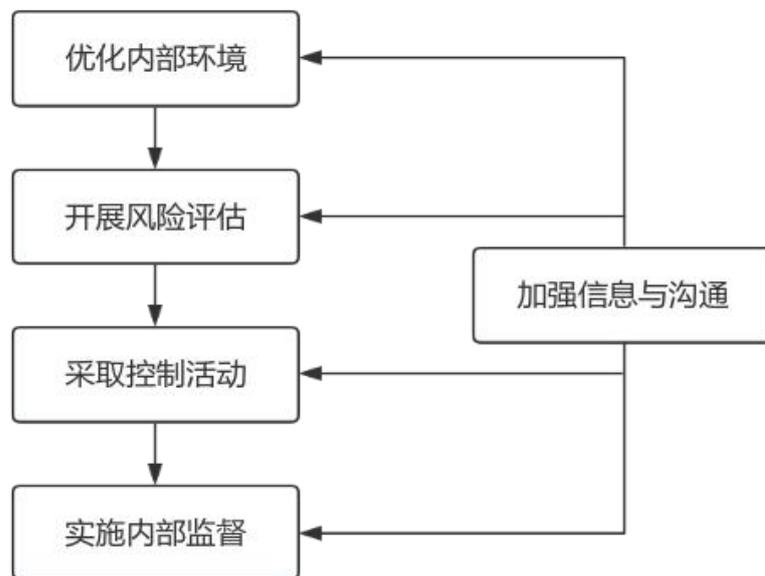


图2.1 内部控制五大要素

2.1.3 融资约束

随着金融发展与创新, John Meyer (1957) 是首位引出融资约束 (Financing Constraints) 这一概念的学者, 传统的融资约束理论主张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以及代理问题是导致融资约束问题出现的核心因素。人们逐渐认识到, 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也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非效率性, 从而使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偏离最优状态。Modigliani和Miller (1958) 的MM理论认为, 在完全资本市场中, 公司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无关, 内外部融资成本相同。但Myers和Majluf (1984) 指出, 由于外部资本市场的完善, 如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 企业内源融资成本低于外部融资, 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使企业在面对高收益要求时可能选择放弃融资, 从而产生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在导致外部融资成本上升中的作用。他们指出, 代理问题同样加剧了外部融资与内部融资之间的成本差异。即便是在没有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情况下, Stiglitz和Weiss (1981) 也提出企业在通过外部金融市场融资时, 会面临一系列交易成本, 如谈判、签约和监督等费用, 这些交易成本同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 导致了融资约束问题。

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在1932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Berle与Means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 该理论主张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明晰分离。在这一框架下, 企业所有者仅保留了对收益的索取权, 而公司的日常运营则全权委托给具备专业资质和丰富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自委托代理理论问世以来, 众多学者纷纷将其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 通过多角度的深入探讨, 为剖析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类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从而构建起了系统而丰富的理论体系。1976年, Jensen与Meckling从信息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他们没有选择传统的信息完全性假设, 指出在实际情况下企业管理者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 其利益诉求往往与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在信息传递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障碍, 使得信息在两者之间并

非完全透明和对称。在公司内部，主要存在着两种典型的代理关系。第一种是企业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管理层与股东在利益和目标上存在差异，管理层有时可能会为了追求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或职位晋升，而采取掩盖或隐瞒对公司不利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增加了公司的运营风险，还可能引发股价崩盘等严重后果，从而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权益。另一种代理关系则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有限，大股东往往成为小股东在公司中的代表，参与公司的决策和治理。然而，当大股东的利益与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大股东可能会利用其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采取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损害了公司的形象和声誉。

非正式制度中的企业文化和道德约束对于缓解这两种代理冲突具有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管理者和大股东的道德标准，在降低企业委托代理成本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2 传统型权威理论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无疑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最主要和最基础影响的要素，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明文规定的正式制度，还包括了那些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非正式制度。首先，从正式制度的视角来深入剖析，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和正式确立的制度架构，旨在通过一系列规范化、标准化的手段来约束和引导社会的各类行为，这种制度性安排以法律条文、行政规章、契约合同等多种具体形式呈现，其核心目标在于为社会成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行为划定清晰的边界和准则，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其次从非正式制度讲，非正式制度主要指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守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非正式制度则是从主观上产生的行为标准，与正式制度相互补充，共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态。诺斯，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提出非正式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正式制度只是作为明文条例规范行为的一小部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其影响力不容忽视。它常常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正式制度设置的最高标准和基

础，为制度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理论支撑，因此，传统型意识形态在制度约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诺斯把正式制度视为一种“工具”，把意识形态看作“目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非正式制度的理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既有推动力也有反作用力。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这说明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变化，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他提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力量，不仅能够在无形中支配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还具备一种超越个体控制的特性，能够反映并满足人民的深层愿望。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认为，意识形态通过塑造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对制度的形成、变革和维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理解制度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与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更多地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共识和习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式制度的约束是以特定的人类群体之间互动的方式来确立。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对一小部分人群施加制度性的约束。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或个人的活动方式和行为选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相辅而行共同发展，它们才能充分展现其潜在价值。从理论分析来看，非正式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协调功能以及凝聚功能等三种基本功能，在企业运营中，正式制度旨在约束员工的行为，而非正式制度则旨在增强员工对正式制度的认同感，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遵循正式制度的约束和行为规范，从而使企业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为转换的可能性，非正式制度形成的规范能促进制度上的创新。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变迁，原有的正式制度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瓦解，然而其深层的理念与价值观念并未随之消逝。这些制度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他们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中，不再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存在，却以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

行动。这种非正式制度，虽无正式制度的明文规范，却有潜移默化之力，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持续影响并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1970年，Akerlof在其著作《柠檬市场》中首次引入了“信息市场”，他深入剖析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他指出，在二手车交易中，卖方往往掌握着更为详尽的车辆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买方在交易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买方可能花费高昂的价格，却最终购得质量低劣的车辆，从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此外，金融市场中也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难以获得被投资企业的全部真实信息，这导致投资者可能因为信息不足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从而遭受损失。这些现象都揭示了一个事实：信息不对称是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打破了传统市场信息均匀分布的经典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运作的复杂性，还为解释资本市场中的各种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公司金融领域，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应用尤为广泛。例如，在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投资者往往要求一个相对平均的利润水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这种平均化的利润要求可能导致优质公司因为融资价格低于项目价值而放弃有价值的投资项目，而劣质公司则可能继续融资以维持运营，从而引发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的现象。同时，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管理者在签订合同后，其实际工作情况往往难以被董事会和股东准确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为公司高管提供机会，利用职权损害股东利益，而为了应对这种道德风险，资金供给者通常会要求增加道德风险溢价，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融资压力。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于企业融资约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资金供给者在决定是否为企业提供融资时，会考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者对企业的信任度会降低，进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这种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相应增大，限制了其获取资金的渠道和能力。

2.2.4 声誉理论

随着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声誉理论被提出并开始崭露头角,它深入剖析了声誉的产生原因、作用机理以及对企业和市场的深远影响。声誉理论一开始提出主要关注于声誉如何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障机制,而声誉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与经济学理论进行结合,当时Fama(1961)提出了一个关于经理人市场的理论,该理论表明即便企业未构建激励机制,经理人在企业中也并没有面临明确的绩效考核压力,职业经理人仍然会保持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因为员工不仅仅只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当员工意识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时,声誉效应会使他们会感到与有荣焉,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声誉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学者都对企业声誉进行过研究,一些学者提出,声誉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反复博弈过程,因此声誉是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双方收益的损失,即企业声誉的缺失,企业为了维护声誉而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企业声誉构成了企业独特的差异化优势,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外界形象,还能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声誉的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对企业自身经营业绩的影响上,学者们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上探讨了声誉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机制为企业创造优势的。

在另一个层面上,声誉理论强调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持续盈利不仅取决于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更与社会责任挂钩。基于声誉理论,学术界普遍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具有显著作用。具体而言,企业积极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越多,其声誉就越能得以增强。这种良好的声誉不仅赋予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强的优势,还使其经营状况更加稳健,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市场的波动。从声誉的维度来看,学者们将企业声誉细化为财务绩效、产品品质、员工关系、企业文化、环保表现以及组织管理等六个方面,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企业声誉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发现这与企业非正式制度的要素相契合。因此,在我国学术界,非正式制度被看作是衡量企业声誉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且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对企业的经济责任以及其他非经济责任如何影响企业声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验证。

3 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现状分析

3.1 我国上市公司非正式制度现状分析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以正式制度作为基石，而非正式制度则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国从建国以来到如今的改革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调节在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在外部环境逐渐稳定的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环境都会展现出各自独特的表达和形态：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自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意识形态也因时代的变迁而融入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达内容：

首先，在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推动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以及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建国初期的“一五”计划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以重工业为侧重点，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工业的整体水平，还为其未来成为一个拥有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1957年到2012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段时间内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经历了一系列的反思、变革和发展阶段，使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最终崭露头角，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最后，2013年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及制度的信念坚定不移，这份自信不仅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源于实践的检验与历史的积淀。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亦凭借卓越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强烈的自信心，与全球众多知名企业同台竞技，展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如今，中国正以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形象，以负责任的态度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文化传统层面出发，中国文化可以被精妙地划分为两大板块：即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富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筑了独具一格的文化体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历经千年沉淀，成为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儒家文化不仅倡导理性主义与文人精神，更在“利”与“义”的思辨中，展现了对集体主义的坚守与对道德品质的崇尚。其核心理念“仁”，即“爱人”，鼓励人们以和谐为本，与人为善。同时，儒家文化也注重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统一，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荣誉感，以及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中，以“仁”为行为准则，尊重他人，珍爱自我。而“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生活哲学，鼓励个体在修行中追求自我完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维度。这一文化特色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西方文化，进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简朴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先进相互融合，共同引领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文化方向。

从伦理道德层面分析，中国伦理道德可细分为中国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两大类。中国传统道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虽历经波折，但在当代社会重新得到肯定。而市场经济道德则基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市场实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优秀元素正焕发新生，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观念对于市场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它既是法律的基础，也是道德的体现，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然而，市场经济中也不乏道德缺失的现象，如商业投机行为等，这凸显了完善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迫切性与长期性。

3.2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价值增值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层出不穷的财务欺诈事件被揭露，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和紧迫性越发凸显。我国的监管机构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旨在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政策文件，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其目的是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从而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

以下是CSMAR数据库中过去五年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披露数据：

表3.1 2017年-2021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情况表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重大缺陷	38	73	128	129	104
占比	3.7%	6.1%	9.4%	8.9%	9.8%
重要缺陷	38	52	74	37	54
占比	3.7%	4.3%	5.4%	2.5%	3.5%
一般缺陷	956	1077	1165	1285	1371
占比	92.6%	89.6%	85.2%	88.6%	89.7%
缺陷总数	1032	1202	1367	1451	1529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根据数量被分类为重大、重要和一般这三个级别，当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做出投资时这些信息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如表3.1所示，在2017至2021这五年中，上市公司披露的缺陷数量呈现增长态势。其中，一般缺陷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重要缺陷，重大缺陷则较少出现，但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公开披露一般缺陷，这也意味着内部控制缺陷是普遍存在的，或者是上市公司刻意隐瞒缺陷，掩盖相应的风险；同时，在披露缺陷方面，也存在一些企业缺乏主动性以及对自身内部控制状况关注不够等因素，使得信息使用者无法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关于内部控制的缺陷整改，目前的状况并不太乐观，很多上市公司对于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并未保持积极的态度，其整改进度相当缓慢。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近五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整体上是令人满意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1) 内部控制的战略目标缺失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面临战略目标缺失的问题，这顺理成章的就导致了企业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首先就是企业所制定的战略目标与其发展前景是脱节的，这种脱节不仅可能导致企业在发展方向上的迷失，还可能影响企业整体战略的有效性。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应与其发展前景保持一致，并起到基石的作用从而实现企业的发展。当企业在制定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发展前景，导致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明确的战略导向。其次，在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时忽视了风险容量的重要性，风险容量是企业所能抵

御或降低的风险程度，它包含了风险识别能力和控制手段两个方面，代表了在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所能接受的风险，但很多公司忽略了这一点，选择了多样化的投资策略，却忽视了风险容量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

在构建风险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忽视了遵循既定程序的重要性，这无疑导致了未来的风险管理存在隐患。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企业在“事项识别”方面的认识尚显不足，往往只看到了机遇，却没有认识到潜在的风险。在进行风险评估时，企业往往只是程序化执行，这导致对风险的评估缺乏全面性和深度，也没有考虑到隐藏风险的存在。在应对方案制定方面，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致使企业无法及时调整自身的策略和方向，忽略了对潜在风险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评估。最后，我国的企业在控制活动方面设计上也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控制力不足的问题。

（3）信息传递和沟通能力不足

无论在企业对外还是对内活动上，信息的传递都是不可或缺的，企业要进行决策时需要大量信息来支持，这些信息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识别、评价以及应对各种风险，从而达成企业既定的目标。目前我国企业管理者普遍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深入挖掘有效信息的能力也不足，导致信息反馈滞后，影响了决策效率。在交流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沟通的困难，其实际效果显然是不足的。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企业管理者普遍缺乏沟通意识。在公司内部的沟通中，与董事会的沟通存在不足，同时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也显得困难重重。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企业在与投资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

（4）内部控制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

在企业的日常运营中，内部控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必须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各个关键环节进行全面的评估与监督。这一过程并非单凭企业内部的力量就能完成，也需要与外部监控力量的相互配合。从理论上讲，内部审计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外部监控体系，但其监控效果仍然明显不够，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监督和政府监控的执行力度不足。

（5）内控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

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很多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不足，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投资回报，进行披露造假，而忽视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或者是由于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没有对内部控制进行准确的界定，这导致企业难以判断其内部控制的具体缺陷是什么，这也会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上市公司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然而这些企业在没有认识到隐藏风险的情况下普遍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不会出现重大的缺陷。许多公司并未如实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甚至有一些企业选择故意隐瞒这些缺陷。在披露缺陷时，一些公司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对缺陷的描述含糊不清，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使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难以准确理解其内部控制的真实状况。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企业甚至做出了混淆视听的行为，通过模糊的语言或误导性的陈述，试图掩盖其内部控制的严重问题。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信息披露的透明性原则，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企业若采取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行为，不仅会阻碍投资者获取所需信息，也会削弱内部控制的实际效能。这种做法与我国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它使得企业的内部控制与战略决策难以有效融合，更可能危及投资者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在内部控制中，真实、透明地披露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明智的决策，也是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行为，确保内部控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隐瞒内部控制缺陷既妨碍了信息的透明传递，又削弱了内部控制的实效，与我国的内控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可能对企业 and 投资者造成双重损害。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国财政部出台了相关文件，希望能够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作为一项工作来做。尽管现在的大部分公司都已根据法律和法规定期公开其内部控制信息，但这些公司大多数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真正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导致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没有得到真实反映，对投资者而言，这也使他们无法准确判断企业的实际价值。

3.3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现状分析

在各类企业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初创期的稚嫩企业，还是成熟期的行业巨头，内外部资金持续稳定的支持，是企业稳健成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因此，对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扩张来说，确保融资渠道的畅通无阻和融资环境的优化升级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易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我国的融资环境下，国有企业由于自身庞大的规模和独特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对其的倾斜和支持，往往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融资待遇，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其规模限制，无论是企业筹集自有资金还是向投资者或机构融资，都面临着较大的融资约束，这使很多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无法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尽管我国为了缓解融资约束问题分别出台了多项融资便利化措施，如新融十条、小微金融、普惠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等，但这些措施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并不明显，融资约束仍然是制约我国中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这一难题，需要对融资约束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从具体角度分析，我国的企业在进行融资活动时，主要遭遇了以下的一系列难题。第一，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对于企业来说，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特别是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由于国家和政府政策更倾向于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这些中小型企业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常常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这也导致银行、机构和投资者在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时变得更加谨慎，融资条件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也更为苛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时常常面临难以融资的局面。虽然我国提供了通过上市来筹措资金的融资渠道，特地为中小企业开设了创业板，但由于很多企业不具备进入创业板的调教，因此此举无法适用于大部分中小企业，起到的实际效果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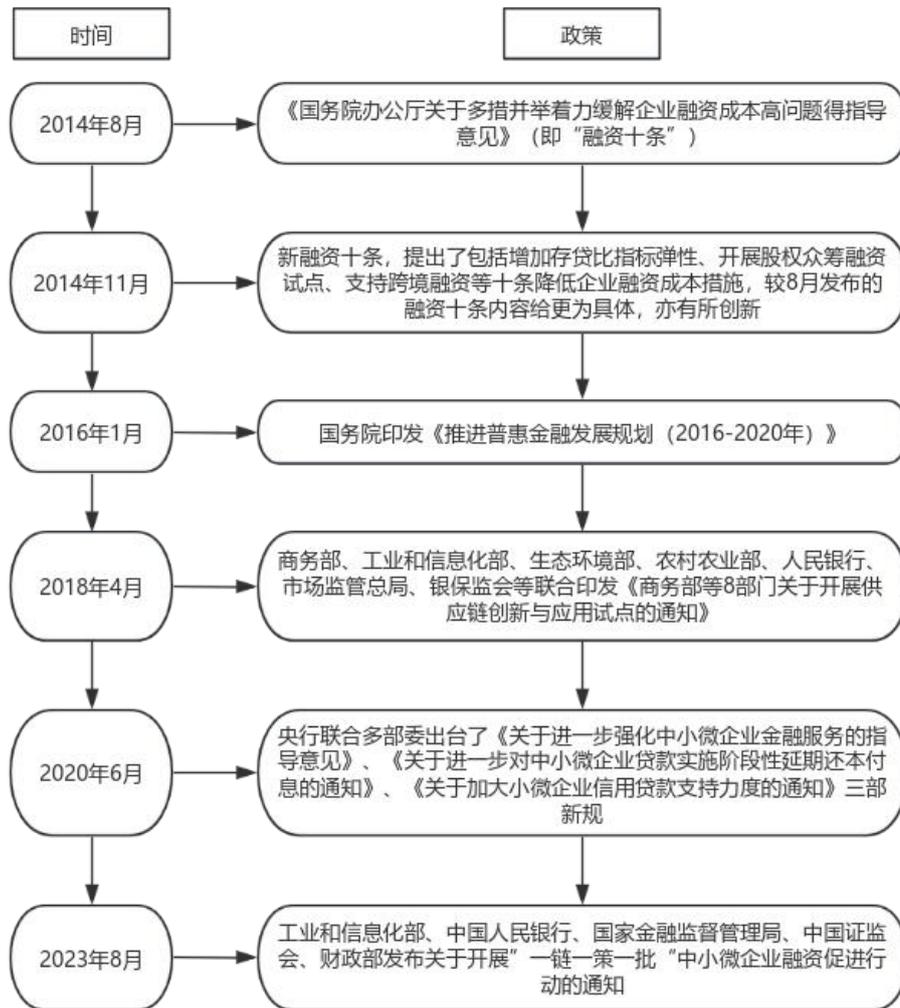


图3.2 我国关于融资的相关政策

上市公司虽然具备通过发行股票等途径来筹集资金的多元化融资选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上市公司依旧被融资约束所困扰。对于中小型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其本身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求,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持续增长,它们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随之加大,这导致资本投资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很多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充裕,实际上,很多企业投资现金流量的敏感度极高,一旦现金流出现波动,就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相较于大型上市公司,中小型上市公司的结构显得不那么完善,因此,对于中小型上市公司来说,其经营过程和管理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企业运营和管理方面,通常存在大量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些内部机构里

，最主要的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经理在受委任时，虽然拥有全面审视公司管理的权限，乃至更广泛的考虑范畴，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当他们过度涉足高风险的投资决策时。这种管理层的宽泛权限若未得到恰当限制，并不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特别在信用危机爆发后，银行对于贷款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他们对企业进行信用背景审查的严格程度也随之上升。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因高投资风险而信誉受损的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资金支持时面临更大的困难。简而言之，过度的投资冒险与当前严格的信贷环境相结合，可能导致高风险公司在融资方面遭遇重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银行的贷款，财务上的限制变得更为严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些企业通过上市来缓解融资困境。相较于中小规模的上市公司，大型公司拥有更为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风险较低，并且更符合金融机构的筛选流程，这为它们提供了更广泛的融资途径和机会。此外，在融资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虽然融资约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突出，但仍然存在不少挑战和问题需要解决。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4.1 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和产权制度仍待完善的社会环境中，正式制度存在的局限性导致非正式制度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商会等非正式制度在融资过程中，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的障碍、构建有效的担保机制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为民营企业铺设了更为顺畅的融资道路，使其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非正式制度在促进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信息流通、降低交易成本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推动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积累与声誉机制的形成，还能显著提高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从而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深入梳理，我们发现非正式制度通过构建正式与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平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以及依赖声誉监督机制等三个核心方面，对企业融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文献充分证明了非正式制度在推动企业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缓解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不仅可能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偏离实际价值，还可能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首先，非正式制度构建的互通性机制打破了行业界限，为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渠道，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减轻了企业融资约束。徐建卫等学者（2020）进一步指出，商会内部通过搭建共享经济平台，显著的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内部交易活动，进一步强化了非正式制度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也为企业的融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会。盛佳铭等（2019）指出，借助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力量，非正式制度所包含的非正式信息的传递展现了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有效缓解信息失衡的问题上，显著降低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这种信息交流的优化，有效遏制了道德风险，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得到了有效防范，进一步地，这种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增强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有助于缓解企业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2）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一般而言,在非正式制度完善的企业中,管理者往往展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些管理者在工作中,会更具有自觉性和积极性,对营私舞弊以及贪赃枉法等行为能够进行有效克制,从而降低发生违规和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非正式制度在降低企业委托代理成本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进一步地,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委托代理成本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企业委托代理成本较高时,往往伴随着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影响企业委托代理成本,从而对融资约束产生影响的,非正式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效率,从而减轻融资约束,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 依靠声誉机制

非正式制度所特有的声誉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社会性激励,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能够有效补充企业声誉这一无形资产,从而向外界传达更多有利消息。声誉理论提出企业所拥有的声誉越高,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就更加珍惜企业声誉,进行道德约束的程度就越深,有效降低道德风险,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越高,从而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罗劲博(2016)通过研究沪深A股市场2006-201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非正式制度越完善的企业会拥有更强的声誉和商业信用,凭借此社会资本,会更容易获得贷款。

由此三点,本文提出假设H1:

H1:在控制其他影响条件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负相关,即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4.2 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非正式制度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可以通过传统型权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将非正式制度分为企业文化、社会资本和管理伦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员工间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信仰、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不仅涵盖了企业的历史传承,更是现代管理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深入涉及企业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以及外在形象,是企业在激烈

市场竞争中积累与提升的实践经验的体现,是实现员工的自我成长与突破的关键支撑,它能显著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提升管理质量。因此,深入探究企业文化建设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传统权威理论提出,企业文化体现了全体员工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认知程度,是内控制度的实施在全体员工中形成的接受程度和精神结果,是一种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理念。尽管企业文化是无形的,但它可以影响引导员工的有形行为,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企业文化就不会有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一个健全的企业文化是决定内部控制制度是否高效的关键,企业文化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强化内控制度来发挥出来。由于企业文化具有主动性和自律性,而内部控制制度则是一种被动和他律的存在。企业文化对内控制度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能传递出进取、勤勉尽责和诚实守信的精神,并且这种文化与其内部控制制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那么制定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则会提升,而成本将会减少,同时执行的效果也会得到提升。反之,如果企业文化是狭隘、保守、落后的文化,则会导致企业内控制度失效。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中之所以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激励功能,这种激励机制使每个人都有动力去工作并最终达到共同目标。

企业的文化理念与其内部控制机制是相辅相成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决定了企业能否长期健康地发展。即使是最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也可能存在缺陷。因此,仅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来规范员工行为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与其文化理念应当紧密相连,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层面的要求,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融合。此外,在注重外部约束的制度设计时,还需要从加强员工内部自我约束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所以说企业文化建设也要以内控制度为载体。从另一个角度看,构建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仅反映了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支持企业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所以说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应该与企业文化相辅相成。在全体员工普遍认同的基础上,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有可能被提升至企业文化的高度。简而言之,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具有“刚”的特质,而企业文化则是“柔”的。只有在刚柔并济的企业环境下,才能有效地减少内部控制的不足,并维持一个高效的内部控制机制。

(2) 企业社会资本与内部控制

企业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非正式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不仅覆盖了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也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和部门。这个网络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更在无形中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决策质量。在纵向网络中,信息的流动和传递往往依赖于这些非正式关系。虽然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已经日趋扁平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仍然存在。高层管理者通过这些非正式关系来培养忠诚的下属,而下属则期望通过这些关系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然而,这种非正式关系也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可能导致正式制度的失效,使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变得困难。相比之下,横向网络中的合作则更多地基于平等和信任。在基层员工之间,他们通过合作来完成任务,这种合作是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当员工之间的信任度越高时,他们的合作就越加默契,信息的传递也更加迅速和准确。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还能最大化地利用企业资源,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这种横向联系有助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加快信息交流,从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3) 企业管理伦理与内部控制

管理伦理,作为一种非正式规范,旨在调整企业内外的复杂关系,为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指引,明确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应予以避免,涉及到员工行为的规范性、人际间的信任与合作程度,以及是否存在欺骗等,管理伦理研究涉及到管理学的各个领域,但其核心是探讨管理者如何进行有效地组织、领导,使之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型权威理论强调,管理伦理应被视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实现企业的有序、协调、健康与持续发展,这不仅在于追求经济效益,更在于实现社会伦理与企业责任的和谐统一,即企业的经济性与公益性的完美结合。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领导者的权威与智慧,以及企业文化和激励制度等多中约束因素的共同推动。

管理伦理是企业管理层与员工间无形的默契,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行为,对塑造企业文化与职业道德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伦理原则,更是管理工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在于全体员工的严格执行与恪守,确保企业稳健发展。委托代理理论指出,若企业只顾发展而忽略伦理建设,就有可能导致员工忠诚度的下滑等一系列负面现象,如频繁跳槽、工作缺乏积极性、责任心缺失、为了自身利益而

侵占企业财产等，这些对企业的声誉、形象、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都是巨大的影响。因此，积极推进管理伦理建设，对于提高内部控制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的伦理观也在不断进步，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也日趋人性化，更加关注员工的利益与权利。如今，员工不再被视为简单的工具或机器，而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社会人，内部控制的目的也从单纯的约束与规范，转变为激励员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正是企业进行伦理建设的原因，也是内控制度与伦理建设相互融合的体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缺陷呈负相关关系，非正式制度建设越完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程度越低。

4.3 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投融资问题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樊后裕和丁友刚（2016）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关系，得出结论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内部控制越完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往往越小。对于投资者而言，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他们评估企业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份报告不仅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率，还揭示了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常常被视为企业财务和运营风险较高的潜在信号，这一信息在投资者眼中可能意味着企业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们往往会基于对企业风险的评估来权衡投资回报与潜在风险。因此，一旦企业暴露出内部控制的不足之处，投资者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可能会提出更高的风险补偿要求，或者选择减少对该企业的投资金额。这种投资者行为的调整，无疑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加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非正式制度越健全，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往往越完善，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而内部控制的健全，又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因此，可以说内部控制缺陷为非正式制度和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传递渠道。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内部控制缺陷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5 非正式制度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检验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疫情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导致2021年后企业数据缺失以及失真，本文采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包括Wind数据库、CEIC经济数据、CSMAR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了金融类以及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数据；(2)剔除样本区间内ST*的上市公司数据；(3)剔除了数据缺失或异常的上市公司数据。最终得到324家上市公司1620个观测值，并使用State15与DEA2.1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分析。

5.2 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

(1)非正式制度(IN)。为了精准测量非正式制度(IN)的效率，本文借鉴了Demerjian(2012)等学者的研究方法，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通过非正式制度的定义，非正式制度效率的衡量有多种方式，本研究采取财务指标衡量非正式制度效率；在之前理论与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非正式制度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起到一定规范作用，降低各方面成本以及使企业经营和管理效率更高，因此与营业成本、销售与管理费用、营业收入等变量密切相关，而非正式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声誉效应、社会资本以及信息传递渠道则与固定资产净额、无形资产净额、商誉等变量密切相关，从而将以上变量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效率的关键指标。随后通过DEA2.1将商誉、固定资产净额、无形资产净额、营业成本和销售管理费用设定成投入变量，这些变量涵盖了企业经营的主要成本和资源投入，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运营状况。而营业收入设置成产出变量，以此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每一个样本在DEA分析中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决策单元，最终可以得到样本企业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综合效率值Crste。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本研究对综合效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范围限定在0至1之间。

(2)内部控制缺陷(ICW)。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中，依据其对企业运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将其划分为三个层级：一般缺陷、重要缺陷以及重大缺陷

。其中，重大缺陷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它可能使企业大幅偏离原定的控制目标，对企业的运营和战略实施产生深远影响。重要缺陷在缺陷的披露数量上低于重大缺陷，但同样有可能影响企业运营的稳定性和效率，对企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而一般缺陷则相对轻微，通常只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便可恢复正常的控制状态。为了更准确地量化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本文参照了林钟高和丁茂恒（2017）的研究方法。当企业公开披露出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时，将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指标（ICW）设定为2；若企业披露的是重要缺陷，则ICW取值为1；一般缺陷则ICW为0。

（3）融资约束(SA)。融资约束的测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存在多种方法如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以及SA指数、WW指数、FC指数等融资约束指数。这些方法各有其特点。为了更准确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本文借鉴了卢太平和张东旭（2014）的研究思路，采用了SA指数作为衡量指标。SA指数是一种基于企业规模与年龄构建的融资约束衡量指标，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历史、稳定性和成熟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程度。通过构建SA指数，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企业的融资状况，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持。

$$SA = -0.737 \times Size + 0.043 \times Size^2 - 0.04 \times Age$$

企业融资约束可通过SA指数来衡量，根据SA指数对融资约束的衡量方式，SA指数绝对值越高，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

（4）控制变量。在明确了主要变量之后，考虑到除了解释变量外，融资约束还有可能收到别的因素的显著影响，为了更全面地探讨融资约束问题，本研究选择了若干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SIZE），用于衡量企业的规模大小；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DAR），揭示了企业的债务情况；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GJ），体现了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及企业年龄（Age），反映了企业的历史、稳定性和成熟度。此外，本研究还对年度（YEAR）进行了控制，以排除时间趋势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具体定义如表5.1，它们共同构成了本文实证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5.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的测量
融资约束	SA	SA 指数= $-0.737 \times \text{Size} + 0.043 \times \text{Size}^2 - 0.04 \times \text{Age}$ ，取绝对值
非正式制度	IN	将营业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固定资产净额，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作为投入变量，经 DEA 处理后得出综合效率值 crste
内部控制缺陷	ICW	虚拟变量，赋值无或一般缺陷为 0，重要缺陷为 1，重大缺陷为 2
企业总资产	Size	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到统计年度之间的年限
资产负债率	DAR	统计年限期末总负债/总资产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统计年限净利润/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GJ	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5.3 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研究时，首先对数据进行了豪斯曼检验，选择出最合适的固定效应模型。随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三步法，检验了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最后加入内部控制检验内部控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根据前文，本文设计了以下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对应假设H1，当系数 α_i 为负且显著时，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2)对应假设H2，当系数 γ_i 为负且显著时，假设H2得到验证；模型(3)对应假设H3，当系数 α' 为负且 μ_i 为正时，假设H3得到验证。

$$SA_{it} = \alpha_0 + \alpha_1 Crste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Age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DAR_{it} + \alpha_6 GJ_{it} + e_{it} \quad (1)$$

$$ICW_{it} = \gamma_0 + \gamma_1 Crste_{it} + \gamma_2 SIZE_{it} + \gamma_3 Age_{it} + \gamma_4 ROA_{it} + \gamma_5 DAR_{it} + \gamma_6 GJ_{it} + z_{it} \quad (2)$$

$$SA_{it} = \mu_0 + \alpha' Crste_{it} + \mu_1 ICW_{it} + \mu_2 SIZE_{it} + \mu_3 Age_{it} + \mu_4 ROA_{it} + \mu_5 DAR_{it}$$

$$+ \mu_{6GJ_{it}} + \sigma_{it} \quad (3)$$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下表5.2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涉及的数据样本总量共计12960个,下面针对主要变量进行叙述。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非正式制度(IN)方面,样本企业的平均值为0.7942617,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最小值仅为0.128,最大值则高达1,标准差为0.138,这一数据分布表明各样本企业在非正式制度效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融资约束(SA)平均值为3.93,标准差为1.211,说明样本中企业在融资约束问题上面临着较大的差异,有的企业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困境。同时,关于内部控制缺陷(ICW),平均值为0.054,标准差为0.299,反映出部分样本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问题。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也与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无较大偏差。

表5.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SA	1,620	3.932712	1.2116564	2.954518	4.5777
crste	1,620	0.7942617	0.1382634	0.128	1
ICW	1,620	0.054321	0.2994949	0	2
Size	1,620	8.858317	1.275195	4.063227	14.441
Age	1,620	22.19753	3.728493	14	40
ROA	1,620	0.0187471	0.1589483	-3.5654	0.4352

DAR	1,620	0.414721	0.2515875	0.000031	2.4703
					12
GJ	1,620	42.22126	17.19095	0.8989	86.449
					2

5.4.2相关性分析

下表5.3展示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的结果：首先，非正式制度（IN）与内部控制缺陷（ICW）、非正式制度（IN）与融资约束（SA）均显著的负相关，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减少内部控制缺陷，并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其次，内部控制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这些相关性结果为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由下表得出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7，这充分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从而保证了准确性和可靠性。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的相关系数为-0.08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即非正式制度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了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仍需以回归结果为准。

表5.3 相关性分析

	SA	crste	ICW	Size	Age	ROA	DAR
SA	1						
crste	-0.084***	1					
ICW	0.0160**	-0.082***	1				
Size	0.269***	0.119***	-0.044*	1			
Age	-0.521***	-0.0270	0.042*	0.157***	1		
ROA	-0.00800	0.149***	-0.291***	0.158***	-0.065***	1	
DAR	0.059**	-0.0360	0.116***	0.306***	0.182***	-0.323***	1
GJ	0.0150	0.075***	-0.00900	0.251***	0.122***	0.055**	0.216***

注：表中汇报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5.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5.4展示了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回归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首先进行了单变量回归分析，即不引入控制变量，如列（1）所示，非正式制度（IN）的回归系数为-0.03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正式制度（IN）与SA指数（代表融资约束）显著的负相关。表明随着企业非正式制度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会相应减小。其次在回归中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如列（2）所示，在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非正式制度（IN）与融资约束（SA）依然保持着在5%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24，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即非正式制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列（2）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等指标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依然有效，加入净利率指标，发现净利率的提升对企业融资约束有缓解作用，这说明企业经营指标的优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入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变量后，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3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加强。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03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则是会略微减小。

表5.4 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回归结果

变量	单变量回归	加入控制变量
	SA	SA
	(1)	(2)
IN	-0.036*** (-3.41)	-0.024** (-2.44)
Size		0.035*** (8.30)
Age		-0.036*** (-45.62)

ROA		-0.098***
		(-11.66)
DAR		-0.015
		(-1.57)
GJ		0.001***
		(4.72)
常数项	-3.839***	-3.448***
	(-439.03)	(-98.35)
观测值	1,620	1,620
R ²	0.645	0.689
企业数量	324	324
Year	控制	控制
F test	0	0
r2_a	0.555	0.609
F	468.8	316.7

注：（）内的数值是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5.5详细展示了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并且对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首先，为了初步分析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单变量回归分析，即不引入任何控制变量，如列（3）所示，非正式制度（IN）的回归系数为-0.0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缺陷（ICW）显著的负相关，表明随着企业非正式制度效率的提升，其内部控制的缺陷程度会相应降低。为更全面地分析这一关系，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如列（4）所示，在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非正式制度（IN）与内部控制缺陷（ICW）依然保持着在1%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1。这支持了第二个假设H2，即非正式制度越完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程度越低。

表5.5 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回归结果

变量	单变量回归	加入控制变量
	ICW	ICW

	(3)	(4)
IN	-0.019*** (-2.89)	-0.010*** (-2.72)
Size		0.035*** (8.16)
Age		-0.036*** (-45.52)
ROA		-0.096*** (-11.39)
DAR		-0.016* (-1.67)
GJ		0.001*** (4.70)
常数项	-3.934*** (-2,428.82)	-3.465*** (-101.20)
观测值	1,620	1,620
R ²	0.006	0.689
企业数量	324	324
Year	控制	控制
F test	0	0
r2_a	-0.242	0.609
F	8.333	317.2

5.4.4 基于三步法检验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在前两个假设得到验证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内部控制缺陷变量，从而得到模型(4)。对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了如表5.6所示的结果。结果显示，非正式制度(IN)和内部控制缺陷(ICW)均对企业融资约束(SA)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比模型(1)和模型(4)的结果，在引入内部控制缺

陷变量后，非正式制度（IN）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所降低，而非正式制度（IN）和内部控制缺陷（ICW）均显著，这表明，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有一部分通过内部控制缺陷这一中介变量来传导的，内部控制缺陷在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了验证：内部控制缺陷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表5.6 内部控制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3)
	SA	SA
	(1)	(4)
crste	-0.024** (-2.44)	-0.023** (-2.42)
ICW		0.010*** (2.70)
Size	0.035*** (8.30)	0.035*** (8.28)
Age	-0.036*** (-45.62)	-0.036*** (-45.67)
ROA	-0.098*** (-11.66)	-0.094*** (-11.12)
DAR	-0.015 (-1.57)	-0.018* (-1.84)
GJ	0.001*** (4.72)	0.001*** (4.74)
常数项	-3.448*** (-98.35)	-3.447*** (-98.56)
观测值	1,620	1,620
R ²	0.689	0.691
企业数量	324	324
Year	控制	控制

F test	0	0
r2_a	0.609	0.611
F	316.7	287.2

5.5 稳健性检验

5.5.1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

为了确保本论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进一步采用了替换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的度量方法,以探究不同衡量方法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借鉴王善平等学者(2022)的文献所采用的方法,将融资约束的衡量方法由SA指数替换为WW指数。这一指数越大,表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替换后得到了如表5.7所示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列(5)可以得出非正式制度(IN)与融资约束(WW)之间的影响关系仍然显著,非正式制度的回归系数为-0.01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说明在换取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后,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负向作用依然成立,且其显著性保持良好。其次,从列(6)中我们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IN)对企业内部控制(ICW)的影响也依然显著,回归系数为-0.01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与之前的实证结果相一致。最后,列(3)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回归系数为-0.012,而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0.098,两者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之前关于企业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相互印证,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5.7 替换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WW	ICW	WW
	(5)	(6)	(7)
IN	-0.014**	-0.019***	-0.012**
	(-2.40)	(-5.49)	(-2.09)

ICW			0.098**
			(2.35)
Size	0.057***	-0.004	0.057***
	(8.49)	(-1.05)	(8.56)
ROA	-2.005***	0.065*	-2.011***
	(-34.91)	(1.84)	(-35.03)
DAR	0.000	0.002	-0.000
	(0.00)	(0.86)	(-0.05)
GJ	-0.050	0.030	-0.052
	(-0.16)	(0.16)	(-0.17)
常数项	0.952**	-0.971***	1.046**
	(2.00)	(-3.32)	(2.19)
观测值	1,620	1,620	1,620
R ²	0.450	0.062	0.452
公司数量	324	324	324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F test	0	0	0
r2_a	0.309	-0.178	0.311
F	142.6	11.56	129.3

5.5.2 滞后回归

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减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估计偏差,本文深入考虑了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作用的滞后性。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往往存在滞后性,因此借鉴了郑石桥等学者(2020)的研究方法,对非正式制度效率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处理,并进行了相应的回归分析。

如表5.8所示滞后一期非正式制度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列(8)得出,非正式制度(IN)对融资约束(SA)的影响在滞后一期后依然显著,非正式制度的回归系数为-0.0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即使在考虑了时间滞后效应后,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负相关依旧稳健,与之前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此外,从列(9)可以观察到,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也依然显著,非正式制度的回归系数为-0.017,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0.017,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两者在5%和1%的水平下分别显著,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关于企业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5.8 滞后一期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3)
	SA	SA
	(8)	(9)
L.crste	-0.021** (-1.89)	-0.017** (-1.50)
ICW		0.017*** (4.10)
Size	0.020*** (3.72)	0.020*** (3.66)
Age	-0.034***	-0.034***

	(-34.70)	(-33.50)
ROA	0.014	0.013
	(1.47)	(1.41)
DAR	-0.025**	-0.023*
	(-2.13)	(-1.96)
GJ	0.001***	0.001***
	(4.04)	(4.11)
常数项	-3.381***	-3.387***
	(-77.84)	(-78.02)
观测值	1,620	1,620
R ²	0.609	0.615
公司数量	324	324
Year	控制	控制
F test	0	0
r2_a	0.475	0.483
F	250.4	171.2

6 研究结论与对策

6.1 研究结论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融资约束已成为企业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亦长期吸引着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本文从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深入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传统型权威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等多重理论框架，本文详细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的具体影响，以及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融资约束关系中所起的中介效应；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2016~2020年324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择了衡量各变量的指标，并收集了相关数据，设计了合理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显著缓解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非正式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将逐渐降低。最后，进一步证实了内部控制在非正式制度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6.2 对策建议

6.2.1 内部控制环境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企业应重视非正式制度在内部控制环境建设中的作用，通过定期进行伦理和合规培训、建立约束制度文化、促进道德与法制观念的融合等方式，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风险，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声誉和信誉度，进而融资缓解约束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优秀的内部控制环境，不仅是企业高效运营的基石，更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情况中，许多企业尽管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熟练的员工，但由于内部控制环境的不理想，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此时，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无形的制约机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模式显得尤为关键

。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因素，在塑造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还直接关系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中的各种因素，对于优化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这些因素作用于内部控制的“人”时，它们起到了柔性约束的角色，进而对企业的经营和决策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分析，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优化内部控制环境的具体措施，为了更好地实施，可以参考以下建议：（1）将伦理和合规的意识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增强他们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合规观念，提高员工对相关规章制度的认知和遵循，同时加强沟通与反馈的机制，创建一个开放且透明的交流渠道，重视员工的观点和建议，使员工的意见得到有效反馈，以便及时地调整和优化公司的内部政策和工作流程。（2）构建一种约束性的制度文化。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明确的奖励和惩罚措施，以及信誉评价和管理，通过文化的软约束功能来增强内部控制的效率，明确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并确保这些价值观被有效地整合到日常的运营和决策过程中。通过组织培训以及协同合作，致力于加深员工对公司文化的了解和认同。（3）推动道德和法律观念的深度结合。提升员工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确保他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使内部控制的作用得到发挥。（4）应当积极推广道德、责任感和诚信等非正式制度。高级管理人员应该通过他们的实际行为来展示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坚定承诺，树立正面的榜样，引导员工采取正确的行为方式，以形成一个公正的内部控制制度环境，并借助企业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最终实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

6.2.2 企业文化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本土企业文化的独特力量。企业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其内在的文化观念有深刻的认知，对于深入洞悉企业经营决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至关重要。企业文化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员工，最终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到组织的绩效水平，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融合了管理准则和认知，它是在

长时间的商业活动中逐步塑造出来的，并应更有可能对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则。企业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与商业模式的象征，提供了一个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深入研究企业管理框架的机会。这种研究对于理解我国企业如何塑造其独特的管理策略和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行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传播，明确定义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如诚信、创新、责任等，并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宣贯。通过培训、会议和日常管理活动，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企业文化的内部培育举办团队建设活动和企业文化日，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提出建议和创意，增强内部创新动力。积极的对外宣传和品牌建设通过公关活动、社交媒体和企业网站等渠道积极宣传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and 行业交流，提升企业和社会和行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构建高效的沟通机制建立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确保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有效流动。定期举行员工大会，及时向员工传达公司发展战略和市场动态，增强员工的参与感。强化激励与认可机制，设立绩效考核和奖励体系，鼓励员工积极贯彻企业文化，提升工作绩效。维护企业声誉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行为，维护良好的企业声誉。在面临危机时，积极采取措施，保护企业形象，确保对外传递的信息一致性和准确性。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确立和传播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的企业文化，加强对外宣传和品牌建设，构建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强化激励与认可机制，企业可以提高市场信誉，增强内部团结，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在融资活动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和更广泛的渠道。通过这些措施，企业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增强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

6.2.3 信息与沟通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社会文化因素在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惯例、习俗、关系等不仅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同时也对企业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机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与此相关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在正式制度安排下形成的正式沟通是企业进行管理的基础，而非正式制度则为企

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实现组织目标。当前,我国上市企业在信息交流与沟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员工结构两级化现象严重,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性较差,导致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常常出现梗阻,小团体难以融入整体,使得企业内部信息流通不畅,甚至可能出现信息孤岛。此外,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也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况。另外,在与外界的沟通过程中,带着明显的有色眼镜,主观性过强,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缺乏敏感性。

为最大化非正式制度在企业管理中的功能,管理层需巧妙运用非制度化控制这一高效且灵活的方式,促进内部信息的畅通交流与有效沟通。首先,管理层应致力于构建内部信息共享机制与双向沟通机制,通过拓宽交流渠道、采用非正式信息沟通等方式,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此举旨在打破信息壁垒,确保信息的流通性与准确性。接下来,应该更加重视市场的建设,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来构建一个和谐的沟通环境。同时,管理层应通过各种方式采集员工的想法,提高信息从基层到管理层的传递效率;此外,加强与外部沟通同样重要。管理层应主动拜访客户、供应商,与同行业先进企业开展交流,运用好“关系”资源,建立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展业务、获取资源,还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与市场竞争力;企业还需要构建一内部与外部的信息共享模型,以增加公司内部员工、企业间的交流频率和深度,并学习前沿的实践经验。在企业的内部环境中,应当构建一个高效的信息管理体系,以确保信息能在组织内部迅速流通。同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工作,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最终,公司有能力和建立一个内部和外部情境的共享框架。情景共享有助于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情景共享模式下,获取他人行为或企业信息程度就越高,从而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或企业的决策。信息和沟通这一非正式机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不仅提高了客户或投资者的期望,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还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限制和障碍。这种非正式机制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企业在管理上的智慧和灵活性,更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2.4 社会资本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积极参与行业和商业活动,定期参加行业会议、研讨会和商业展览,以建立和维护行业联系。通过主办或参与行业活动,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网络,建立跨行业和多层次的社会网络,包括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利用线上社交平台和线下社交活动,拓宽企业的社会联系范围。维护长期的合作关系,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共赢策略增强双方的信任和依赖。在合作过程中保持公开透明的沟通,确保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参与公共服务和慈善活动,提高企业在社会中的积极形象。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展示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

需要深入理解非正式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企业的运营中,股权结构和市场化进程等,实际都是正式制度的体现。然而,当这些正式制度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时,企业便可以借助非正式制度提供的社会资本所构建的关系网络,其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不仅要重视正式制度的完善,更要发掘到非正式制度的巨大潜力。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企业应结合正式制度,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构建一套相辅相成的政策体系。这样,不仅能增强正式制度的执行效果,还能进一步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优势,为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最终,必须深刻认识到商业信誉的塑造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能有效增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机会和能力,进而缓解企业在融资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限制。然而,如果企业过度依赖社会资本,反而可能削弱其独立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加剧融资约束。通常情况下,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银行贷款等渠道筹集资金,本文证实了社会资本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策略,用于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管理。

具体而言,企业应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积极维护良好的商业信誉,展现诚信、友好和负责任的态度,通过与各方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形象,从而增强其在融资市场的竞争力。在面临资金短缺时,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关系网络,寻求更多的融资机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

参考文献

- [1] Bernanke B, Gertler M.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89; 79(01).
- [2] Cull R, Li W, Sun B, et al. Government connec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32(1129): 271-294.
- [3]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R].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81.
- [4]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M]. London: Macmillan, 1977.
- [5] Hadlock, C.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 (5) : 1909-1940.
- [6] Hooghiemstra R, Hermes N, Emanueks J. National culture and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s: across-country analysis[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5, 23(4), 357-377.
- [7] Kangaretnam K, Lobo G. National culture and internal control material weakness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16, 31(1): 28-50.
- [8] Khlif, Hichem.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case of an unregulated marke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Mar 2019, Vol. 23 Issue, p144-160.
- [9] Laeven L.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duce financing constraint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3, 32(1): 5-34.
- [10] Lambert R, Leuz C, Verrecchia R 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 45(2): 385-420.
- [11]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 261-297

- [12]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Demerjian P R, Lev B, Lewis M F, et al.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and earnings quality[J]. *The Financial Review*, 2012, 88(2) : 463-498.
- [14] George A. Akerlof,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5] Zexiy, Exten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 by banks and finance companies[J]. *Advances in Financing*,2016, (30):425~439.
- [16] John Meyer, *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Economic History*[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7,(2):3-5.
- [17]边燕杰, 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2.
- [18]陈汉文, 邵贤弟.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 [J]. *会计研究*, 2000(05) :2-8.
- [19]陈瑶.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 *时代金融*, 2017, (05) : 134-135+141.
- [20]杜永波. “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J]. *财会通讯*, 2016 (08) : 108-110
- [21]樊后裕, 丁友刚. 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吗?[J]. *财务研究*, 2016, No. 010(04) :22-32. DOI:10. 14115/j. cnki. 10-1242/f. 2016. 04. 003.
- [22]高波. 文化、文化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区域差异[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 :39-47+143.
- [23]郭蓉.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 [J]. *财富生活*, 2022, No. 111(12) :7-9.
- [24]胡本源. 企业文化内部控制偏好关系的实证研究 [J]. *新疆财经*, 2018(03) :48-58+66.
- [25]黄生权, 唐小敏. 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02) :65-72.
- [26]黄先海, 吴屹帆.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质量与比较优势 [J]. *国际金融问题*, 2020 (3) : 1-21.

- [27]林海,王鑫.以民间商会为信用中介的中小企业投融资模式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7(04):86-91+103.
- [28]盛佳铭,袁友军.道德风险与社会组织救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对策[J].长沙大学学报,2019,33(04):38-42.
- [29]李洪霞.融资约束、内部控制、盈余管理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文化企业的经验数据[J].齐鲁珠坛,2016(05):44-47.
- [30]李慧媛.商誉减值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J].商业会计,2022, No. 724(04):35-40.
- [31]李莉,张迪.内部控制、管理层能力与融资约束[J].技术经济,2019,38(10):10-16.
- [32]马丁娜.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非正式制度分析[J].商业文化,2006(05):61-63.
- [33]欧阳润平.企业发展中的伦理进步——企业伦理实证比较研究.<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l82zongshu.htm>
- [34]沈烈,孙德芝,康均.论人本和谐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构建[J].金融研究,2014(06):108-112.
- [35]宋蔚蔚,封静.内部控制、融资约束和现金股利[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08):22-28+3.
- [36]宋文辉.基于企业文化视角的内部控制环境优化[J].中国商论,2018(29):90-91+28.
- [37]孙龙婷.企业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与突破式创新[J].价值工程,2022,41(08):98-100.
- [38]孙雨龙.非正式制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21. DOI:10.27140/d.cnki.ghbbu.2021.001002.
- [39]王海兵,张元婧.传统文化嵌入企业内部控制的机制和路径研究[J].会计之友,2019(20):113-119.
- [40]王莉莉.公司治理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研究[J].财会通讯,2021(8):63-66.
- [41]王明琳,徐萌娜,王河森.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吗?——基于家族企业中亲缘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4(03):146-159.

- [42]王清刚. 论企业内部控制的灵魂-从制度建设到道德与文化建设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01):119-125.
- [43]王清刚. 论企业内部控制的灵魂从制度建设到道德与文化建设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01): 119-125.
- [44]徐虹, 林钟高, 毛慧慧. 客户关系交易、内部控制与企业融资约束[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3(02):196-203.
- [45]徐亚琴, 翟胜宝, 汪顺. 企业诚信文化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8(01):12-23.
- [46]杨玲丽.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投资意愿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5): 111-120.
- [47]徐建卫, 黄德海. 中国商会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J]. 管理现代化, 2019, 39(06):38-48.
- [48]杨玉凤, 王火欣, 曹琼.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相关性研究——基于沪市 2007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J]. 审计研究, 2010, (1): 82-88.
- [49]余雁. 企业文化资本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研究 [D]. 江西财经大学, 2017.
- [50]张纯, 吕伟. 信息披露、市场关注与融资约束 [J]. 金融研究, 2007(11):32.
- [51]张金鑫, 王逸. 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两类稳健性视角的研究, 会计研究, 2013(9):44-50.
- [52]张立恒. 企业内部控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研究 [J]. 财会通讯, 2022, No. 892(08): 126-130.
- [53]张美云. 非正式制度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J]. 理论月刊, 2015(6): 11-16.
- [54]郑石桥, 郑卓如. 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 [J]. 会计研究, 2013(10): 28-34.
- [55]朱敏. 伦理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4(26):236-237.
- [56]张宇燕.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57]张冰洁, 张芬. 企业融资成本影响研究——基于金融集聚水平空间外溢视角 [J]. 金融发展评论, 2021, 1:29-42.
- [58]胡莹颖. 北京市非正式制度对初创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 [D].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2019.

- [59]王廷惠.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 开放时代, 2002(03):82-94.
- [60]朱启才.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稳定性增长[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1, 32(04):88-93.
- [61]赵羿安.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吉林大学, 2020.
- [62]王军, 邹广平, 石先进.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6):70-82.
- [63]顾雷雷, 郭建鸾, 王鸿宇.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J]. 金融研究, 2020(02):109-127.

后 记

行文至此，落笔为终，这一年我二十六岁，学生生涯也就此告一段落，叹时光易逝，惜韶华难追。曾阅过些许感人肺腑的致谢，也曾想过自己要写些什么，但执笔于此，心中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却不知如何描述。回首过去，每一步都有迹可循，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生逢盛世，与有荣焉。我要感谢伟大的党和祖国，有幸生于华夏，让我们可以不经战乱不缺衣食，感谢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与帮扶，让我一样的万千学子可以拥有平等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未来我必身怀赤子之心，以报答祖国栽培之恩。

涓涓师恩，铭记于心。我要由衷的感谢我的导师。从论文选题、开题到定稿，老师无数次悉心指导，让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在读研期间，何其有幸遇见许老师，还记得初见时，老师幽默随和的言语、亲切爽朗的笑容，让初到外地求学的我有了莫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老师像家中温暖的长辈，在老师面前，我们总能畅所欲言，亦师亦友。每每遇到困难、迷茫无所时，老师都以鼓励为主，总能让我重拾希望，继续努力。我要真心的感谢他，让在异地求学的我感受到了许多真诚与温暖，他乐观从容、严谨谦虚的生活和学术态度，是我永远的前进方向，在未来的日子里，也祝愿老师能百事顺心、万事胜意！

愿岁并谢，与友长兮。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们，还记得三年前，即将进入陌生城市与未知环境的抗拒与迷茫，来到学校的第一个星期，面对简陋的宿舍环境、没有室友的孤独、新环境的各种不适，是遇见了他们，使我现在回忆过去三年生活，尽是笑容与快乐、感动与美好。和好友彻夜的聊天、清晨的日落、医务室的陪伴、每次生日时，他们准备好的蛋糕与惊喜……因为有很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生活十分有趣。很幸运自己一路走来，在每个阶段都遇到了那么多美好、真诚、温暖、合拍的人，他们伴我成长给我力量，见证彼此的青葱岁月，我大多数的快乐都来源于他们，或者说因为他们，我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也正是他们，让我变得自信且阳光、快乐且向上，让这平淡如水的日子熠熠生辉，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始终充满美好。不管我们今后会继续陪伴，还是各奔东西，我都要感谢他们，温暖着我的每一刻时光。

春晖寸草，山高海深。我要感谢我最爱的家人，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父母。他们用朴素又真挚的爱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阶段，我要感谢他们，供我上学，靠他们伟大的爱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完成学业：感谢他们，让我在健康、快乐、幸福的家庭环境中得以成长；感谢他们，替我遮风挡雨让我衣食无忧从未吃过生活之苦；感谢他们，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更广阔的天空。

始终相信努力与真诚，永远不缺再出发的勇气与信心。再见了，兰州财经大学！再见了！我美好的学生时代！